



北大-林肯中心

经济转型与服务业 跨国公司区位战略

贺灿飞 等 著



科学出版社

经济转型与服务业跨国公司 区位战略

贺灿飞 等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在全球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不断增长、中国服务业渐进式开放的背景之下,本书以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为基础,结合演绎方法和逻辑实证主义思路,对在中国内地的零售业、宾馆业、银行业、房地产业等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全球 500 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战略性空间布局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本书认为,服务业跨国公司在内地内的区位战略包括以下 15 个方面:跟随客户;追随本地市场;跟随国内竞争者;跟随国外竞争者;市场化制度优势;行业制度优势;跨国公司内部集聚;跨公司集聚;同功能集聚;跨功能共聚;同行业集聚;来源地集聚;跨国国家集聚;中心城市优势;政治优势等。

本书可供管理学、经济学、城市和区域研究、地理学等相关专业的师生和研究人员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转型与服务业跨国公司区位战略/贺灿飞等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3-034396-3

I. ①经… II. ①贺… III. ①服务业-跨国公司-区域发展战略-研究-中国
IV. ①F7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02969 号

责任编辑:杨帅英 朱海燕 刘志巧/责任校对:林青梅

责任印制:钱玉芬/封面设计:王 浩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源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2 年 5 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2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0 1/2

字数:464 000

定价:5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丛 书 序

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在过去的 30 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进一步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开始加速推进。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移不仅为工业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保证,而且带来了城市规模和空间范围的迅速扩展,在基础设施、城市住房、土地利用、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带来严重挑战。土地作为政策工具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城市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未来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为了应对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与挑战、推动政策研究和人才培养,北京大学与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于 2007 年 10 月在北京联合成立了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简称“北大-林肯中心”)。

北大-林肯中心致力于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及公众提供交流和讨论平台,针对中国城市快速发展、土地政策和财政改革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供专业知识、教育培训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已与国内外专家学者在财政税收、城市发展、土地利用与管理、住房及环境政策等领域进行了多方面的合作,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推动学术思想及专业信息的交流与传播,中心决定出版“北大-林肯丛书”,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呈现给读者。该丛书包括专著、编著、译著、论文集等多种形式,横跨经济学、地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人口学及其他交叉学科。丛书既介绍了我们所关注领域内的最新理论、实践以及国际经验,也介绍了国内外专家学者针对中国在这些领域的政策、现状及未来发展所进行的最新研究。我们希望,丛书结合国内外学者的智慧,能有助于学生、学者、政府人士及社会公众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及挑战,探索科学合理且行之有效的对策。我们也希望,丛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激发更多的学生、学者和其他人士投入到对中国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方面的学习与研究之中,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国民的富强献智出力。

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满燕云

2010 年 11 月 11 日于北京

前言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来自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的跨国公司开始大规模对外进行直接投资,推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全球经济进入激烈的重组阶段(Dicken, 2010)。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由 20 世纪 80 年代的 1000 多亿美元快速增长到 2007 年的 2 万多亿美元,2009 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回落到 1.1 万多亿美元(UNCTAD, 2010)。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驱动国际生产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将中国这样的经济转型国家直接纳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充分利用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和政策优惠。全球经济转型既体现世界经济技术结构的转变,也反映全球经济的空间结构重组。

随着发达国家陆续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创新主导型制造加工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以及文化创意产业成为其支柱产业。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则以资本为纽带,逐步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经济体和经济转型国家。同时,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涌现了大量跨国公司,成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贡献者。进入 21 世纪,国际产业资本转移出现了一些新趋势,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如汽车、飞机、化工、机械装备、电子等开始从发达国家向市场广阔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随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市场进一步开放,大量专业化高端服务业资本也加速转移(Dunning, 1989)。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服务业投资以每年 15% 的速度急剧增长。目前全球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已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 50% 以上,世界经济开始步入服务经济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正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简称贸发会)发布的《2004 年世界投资报告:转向服务业》指出的:“在所有区域,外商直接投资的构成均转向服务业”(UNCTAD, 2004)。

服务业国际化是跨国公司国际生产功能片段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交通通信技术和生产技术的进步,跨国公司可以充分利用比较优势、集聚经济以及政策优势的国别差异,实现价值链不同环节的空间分离,将包括区域总部和研究开发、培训、销售、售后服务机构等在内的服务性环节布局到母国^①以外,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外的生产制造环节(Jones and Kierzkowski, 2001; 2005; Krugman et al., 1995)。大型跨国公司高端功能国际化引导生产者服务业跟随母国客户或者竞争者进行国际化扩张,这些生产者服务业包括银行业、保险业、房地产业、物流业、律师、会计、审计、旅游业、广告、企业管理咨询、信息服务等(Kolstad and Villanger, 2008)。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经济体和经济转型国家加快了市场开放程度,放松了对服务业的管制,而包括零售业、快餐业、社会服务业等在内的消费者服务业跨国公司囿于母国市场趋于饱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也快速向其他国家扩张,如沃尔玛、家乐福、麦当劳、肯德基等跨国企业成功地将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与文化扩展

① 本书中所用母国、东道国等概念并非仅指国家,还包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区。

到全球范围。

与制造业不同,服务业具有非实体性、异质性、不可分割性、顾客参与性、不可储存性等特征,因此其生产和消费具有同时性,对外直接投资较国际贸易更适合于服务业国际化(Bhagwati, 1984b)。服务业跨国公司一般具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为本地市场提供服务。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属于市场导向型投资(Dunning, 1989),更深入地根植于本地经济,对东道国的政策制度反应更敏感(Kolstad and Villanger, 2008)。制造业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主要以资本流和产品贸易形式将全球经济联系起来,服务业国际化则是通过信息、服务、模式、文化与管理经验等链接母国与东道国经济。跨国公司的分公司、代表处、区域性总部的主要功能是收集信息、处理信息并提供知识,研究开发与培训机构的功能是提供知识和解决方案,这些机构通常高度集中于战略性市场的大中城市。生产者服务业尤其重视人力资本、商业联系以及信息外部性,主要集中在各国的经济中心。消费者服务业则取决于跨国公司的战略,可能会追随东道国市场而分散布局。因此,服务业全球化将强化世界主要城市的经济控制力和辐射力,市场潜力巨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和经济转型国家有可能在新一轮的国际资本转移中受到高端服务业和消费者服务业青睐。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实验市场经济。30多年来,中国由基本没有外国资本到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发展中经济体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东道国。截至2009年,中国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9426亿美元,其中2009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900亿美元。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也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获益者,其中,跨国公司对中国直接投资是关键要素。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对中国投资环境不熟悉,再加上面对多变的政策制度,跨国公司在华一般仅设立代表处,港澳企业主要设立出口加工企业。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化,跨国公司逐步积累了本地知识,同时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给予了优惠政策,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制造业,将中国作为出口平台,充分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显著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在渐进式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政府逐步解除了对服务业外资经营业务和地理空间的限制,银行、物流、零售、房地产等服务业跨国公司开始逐鹿中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许诺进一步开放市场,尤其是服务业市场,截至2006年,各类服务业跨国公司原则上享受自由投资的权利。近年来,制造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比例逐年下降,而服务业比例快速上升,2009年达到42.80%,其中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零售业分别占18.66%、6.75%和5.99%。

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一方面与市场需求有关;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渐进式的扩张策略也是重要原因。跨国公司一般采取渐进方式进入国际市场(Johanson and Wiedersheim-Paul, 1975),逐步积累国外市场知识经验,提高调动本地资源的能力。面对中国这样的经济转型国家,由于存在产权模糊、财产权保护能力弱、市场结构不完善、政府干预多、进入壁垒较高和政策较多不确定性等因素,跨国公司更倾向于采取渐进的投资策略(Cui, 1998)。经济转型的不确定性放大了国外投资者收集和组织信息的难度。跨国公司和经济转型国家都需要时间来学习交流,而后者不断调整的政策,

给前者带来了更多挑战。与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开放进程对应,跨国公司在华扩张是一个多阶段过程,涉及高强度的学习和与本地市场的密集互动,多数跨国公司已逐步认可中国市场,从投机者到战略投资者,并最终成为本地主导者(Luo and O'Connor, 1998)。早期,跨国公司只是建立一个小工厂或代表处。随着经济转型的推进,体制的不确定性逐渐消失,跨国公司开始在不同地方建立多个分支机构(Luo and O'Connor, 1998)。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业务范围已从制造逐步扩展到市场营销、管理、研发、教育培训和售后服务等(Ma and Delios, 2010)。不同功能的机构的区位模式可能存在显著差异(Defever, 2006; Enright, 2009)。一些主要的跨国公司已经实现产业链式进入中国市场,充分利用中国不同城市的比较优势、区位优势及集聚优势,将不同功能布局于中国城市体系。

中国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以出口为导向,高度集中在沿海地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则是市场导向型投资,目标是占领本地市场,服务于本地市场。理论上,在东道国市场获取利润的服务业跨国公司必然拥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在中国,服务业跨国公司拥有所有权优势,这可能引致跟随竞争者和先行者区位行为,也是服务业跨国公司开发本地市场、提高市场竞争力的基本要素,这种跟随竞争者和先行者的区位行为导致服务业外资的地理集聚。服务业跨国公司拥有内部化优势,可能引导跨国公司跟随客户投资到东道国,服务于全球化力量创造的市场。然而服务业跨国公司能否开拓本地市场,能否进入东道国为老客户提供服务,取决于东道国服务业的业务开放程度和地域开放程度,以及宏观的市场化程度、法制完善程度和政府干预程度等制度环境。因此,在转型经济中,服务业的市场导向型投资动机是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制度优势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高度嵌入到本地市场,服务业跨国公司对本地化的制度环境尤为敏感,制度优势对于服务业外资区位来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转型经济环境中较高的制度成本、信息成本与交易成本促使服务业跨国公司通过地理接近获取信息,也可能会促使区位模仿行为,从而进一步促进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地理集聚。服务业投资主要服务于中国市场,相对而言,其区位随着市场而布局,甚至进入西部地区的一些重点城市。然而一些生产者服务业如研究开发、物流、金融保险、广告、律师以及其他商务服务业外资,则因为要接近市场和降低信息成本、制度成本等而高度聚集在大中城市。服务业跨国公司这种区位行为将可能成为重塑中国城市体系重要的外部力量,一方面将内陆中心城市纳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另一方面强化中国城市体系高端城市的经济控制力、辐射力与竞争力。

鉴于在经济转型背景下,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特殊区位战略,本书对服务业跨国公司在城市体系的区位选择进行了系统研究。在梳理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态势、中国服务业渐进式开放格局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文献基础上,本书首先建立了转型经济与服务业跨国公司区位分析理论框架,强调制度优势和信息优势与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相结合的重要性。其次结合演绎方法和逻辑实证主义思路,深入研究了零售业、宾馆业、房地产业以及银行业等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区位战略,确认了服务业跨国公司的跟随客户、跟随竞争者、开发本地市场的战略,但这种市场导向型的区位战略取决于制度优势区域差异,转型期政策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引导服务

业外资的市场导向行为。最后,本书深入探讨了全球 500 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战略性空间布局,发现跨国公司采用多次跟进式投资策略,不同时期投资的功能不同,但这种渐进式进入模式导致了公司内不同功能的集聚、跨公司不同功能的集聚,还存在功能集聚与跨功能共聚以及来源地集聚效应。对于全球 500 强公司而言,集聚经济似乎比制度优势更为重要,城市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引导跨国公司不同价值链的功能区位。跨国公司的功能片段化布局既依托中国的城市体系,又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中国城市的空间结构,促进城市体系按价值链等级进行专业化分工,强化高等级城市的控制力和辐射力,并通过跨国公司功能联系促进城市群形成发展。由于研究的需要和便于数据统计,本书中提到的在华投资、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等都是指对中国内地的投资。同时,这些外商直接投资包括来自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的投资,以及其他国家的投资。

本书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新时期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地理集聚研究”(项目编号:40871065)的资助下,由我和我的研究生团队共同完成。硕士研究生朱彦刚参与了第 3 章、第 8 章、第 11 章和第 13 章的写作;博士研究生刘作丽参与了第 11 章和第 15 章的写作;博士研究生王俊松参与了第 7 章和第 10 章的写作;肖晓俊参与了第 12 章和第 14 章的写作;尹薇参与了第 5 章和第 6 章的写作;邹沛思参与了第 1 章和第 8 章的写作,并绘制了本书各章节图件;傅蓉参与了第 9 章和第 10 章的写作;王一帆参与了第 2 章的写作;李燕参与了第 5 章的写作。此外,感谢新加坡国立大学地理系的杨国勇博士对本书第 10 章的学术贡献。

随着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及国际经济形势的改变,市场导向型国际资本将加速向中国转移。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跨国公司价值链高端功能和高附加值服务业将伴随国际资本加快进入中国市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也将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格局和城市体系。限于作者的学识和能力,本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有待进一步深化。书中的不足之处和纰漏之处,还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贺灿飞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目 录

丛书序

前言

第 1 章	21 世纪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态势	1
1.1	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背景	1
1.2	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总体变化	4
1.3	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差异	8
1.4	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	15
1.5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	18
1.6	小结	29
第 2 章	中国服务业渐进式对外开放	31
2.1	概述	31
2.2	银行业	37
2.3	零售业	44
2.4	房地产业	49
2.5	小结	54
第 3 章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研究综述	56
3.1	引言	56
3.2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发展	56
3.3	服务业直接投资特点及国际化模型	60
3.4	服务业直接投资研究现状	62
3.5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评述及展望	67
第 4 章	经济转型与服务业跨国公司区位分析框架	69
4.1	引言	69
4.2	经济转型与服务业跨国公司区位	69
4.3	基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服务业跨国公司区位分析框架	70
4.4	小结	72
第 5 章	零售业跨国公司在华区位战略：以沃尔玛和家乐福为例	74
5.1	引言	74
5.2	外资超市在中国	75
5.3	跨国零售企业在中国的扩张：以沃尔玛和家乐福为例	78
5.4	沃尔玛和家乐福的物流配送模式	88
5.5	沃尔玛和家乐福门店进入城市区位影响因素	90

5.6 小结与讨论·····	93
第6章 跨国宾馆在华区位战略：以星级外资宾馆为例 ·····	95
6.1 引言·····	95
6.2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宾馆在中国的发展·····	96
6.3 在华外资星级宾馆的地理分布 ·····	100
6.4 外资星级宾馆城市区位选择因素 ·····	103
6.5 小结与讨论 ·····	107
第7章 经济转型与房地产外商直接投资省级区位 ·····	109
7.1 引言 ·····	109
7.2 中国房地产外资的制度变革与发展 ·····	110
7.3 中国房地产外资的空间分析 ·····	111
7.4 中国房地产外资区位的理论解释 ·····	116
7.5 中国房地产外资的省（区、市）分布影响因素 ·····	120
7.6 小结与讨论 ·····	127
第8章 市场条件、制度优势与房地产外资企业城市区位 ·····	128
8.1 引言 ·····	128
8.2 市场条件、制度优势与中国房地产外商直接投资区位 ·····	129
8.3 中国房地产外商直接投资政策 ·····	133
8.4 中国主要城市房地产外商直接投资 ·····	136
8.5 中国房地产外资的城市区位影响因素 ·····	142
8.6 小结与讨论 ·····	150
第9章 渐进式银行业开放政策与外资银行在华区位战略 ·····	152
9.1 引言 ·····	152
9.2 理论与实证研究、文献综述 ·····	153
9.3 转型经济与外资银行区位分析框架 ·····	157
9.4 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	158
9.5 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空间格局及其变化 ·····	164
9.6 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 ·····	170
9.7 小结与讨论 ·····	177
第10章 金融机构特性与外资银行机构区位选择 ·····	179
10.1 引言·····	179
10.2 金融机构特性与转型期外资银行区位·····	180
10.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83
10.4 外资银行不同类型机构的城市分布·····	186
10.5 解释中国的外资银行区位格局·····	189
10.6 小结与讨论·····	193
第11章 跨国公司功能区位与城市功能专业化 ·····	195
11.1 引言·····	195

11.2	文献综述	195
11.3	跨国公司不同功能的区位选择	197
11.4	跨国公司功能区位空间格局及演化	198
11.5	跨国公司不同功能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205
11.6	小结与讨论	208
第 12 章	跟进投资与跨国公司功能区位战略	210
12.1	引言	210
12.2	跨国公司功能区位：理论分析	211
12.3	全球 500 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特征	216
12.4	基于条件逻辑模型的跨国公司功能区位模型	224
12.5	小结与讨论	229
第 13 章	跨国公司功能区位：美国、日本与欧盟比较研究	232
13.1	引言	232
13.2	跨国公司投资来源地效应	233
13.3	不同来源地跨国公司功能区位空间格局及演变	239
13.4	不同来源地全球 500 强跨国公司功能区位因素	251
13.5	小结与讨论	258
第 14 章	跨国公司功能区位：以电子信息与医药化工产业为例	260
14.1	引言	260
14.2	电子信息与医药化工产业内全球 500 强在中国的投资	261
14.3	电子信息与医药化工跨国公司功能区位因素	268
14.4	小结与讨论	272
第 15 章	集聚经济、制度约束与汽车产业跨国公司功能区位	276
15.1	引言	276
15.2	汽车产业跨国公司功能区位：理论分析	277
15.3	中国汽车产业利用外资政策	280
15.4	汽车产业跨国公司在华功能时间与空间格局	281
15.5	汽车产业跨国公司在华功能区位因素	284
15.6	小结与讨论	288
总结与展望		289
参考文献		293

第1章 21世纪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态势*

1.1 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背景

近30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各国政策的开放以及中国、中东欧等新兴市场的转型发展,全球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总流入量和流出量从20世纪80年代的1000亿美元左右,上升到2009年的1万多亿美元,其中在2007年甚至达到了2万多亿美元(图1.1)。总体而言,20世纪80~90年代,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增长,特别是到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增速在20%左右。从图中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在近10年来,有两个时间段的增长最为快速,即1998~1999年和2006~2007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流量增幅都在50%左右。不过,这两段时间之后的两三年里,由于美国“9·11”事件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增长率都显著为负,降幅最多达到了40%,从而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直接减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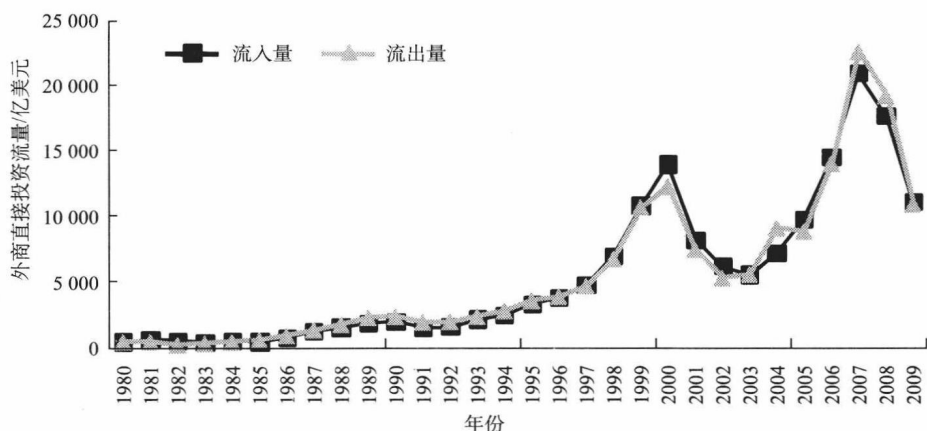


图 1.1 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量趋势(1980~2009 年)

资料来源:历年《世界投资报告》

* 本章涉及国外的数据均来自于《世界投资报告》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其中,发达国家包括: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智利、墨西哥、韩国和土耳其除外),加上不属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欧盟新成员国(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罗马尼亚),外加安道尔,列支敦士登,摩纳哥和圣马力诺。转型期经济体包括:东南欧国家和独联体国家。发展中经济体包括:所有不在以上之列的经济体,为了便于统计,中国的数据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在此统计口径下,中国属于发展中经济体,但实际上,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经济改革正深刻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发展,经济转型背景下的各项活动和现象都值得研究。

国际投资活动不仅局限于发达国家,对2000年和1985年的世界流入和流出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进行比较,可以看到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流向更多国家和地区。在2000年,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24个是发展中经济体)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100亿美元,而15年前则只有1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7个是发展中经济体)。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出情况与此类似。在流入方面,平均每年收到10亿美元以上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家数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7个(其中6个是发展中经济体),增加到90年代的51个(其中23个是发展中经济体)。在流出方面,20世纪90年代有3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11个是发展中经济体)投资超过10亿美元,相比之下,80年代中期则是1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只有1个是发展中经济体)(UNCTAD,2001)。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外商直接投资都有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其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增长迅速,从2000年到2008年流入量增长了2.5倍左右,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增速在某些年份超过了发达国家。虽然到2009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发展中经济体外商直接投资流量有所下降,但仍是2000年的2倍多。

由此可见,在20世纪80~90年代,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在规模上大幅度增长,在地域范围上不断扩张,这一趋势延续至21世纪。近10年来,跨国公司和外商直接投资进一步扩张,更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参与进全球经济体系。外商直接投资在20世纪末的发展为近10年来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培养和营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纵观近10年来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其受到了政策和成本等各种方面的影响和驱使。根据Dunning和Lundan(2008b)的研究,国际直接投资可以概括为四种动机。

第一,资源导向。激烈的竞争迫使跨国公司在新的市场进行投资,寻找低成本资源和生产要素,这也是推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的基本经济动力。而发展中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在于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将发展中经济纳入了全球经济体系。

第二,市场导向。发达国家市场趋于饱和使得跨国公司需要寻求新的市场,从而获取利益,壮大公司的发展规模,实现规模经济。市场导向包括跟随供应链、适应市场的本地需求、节省交易成本和跟随客户等方面。另外,跨国公司需要利用世界市场来增加需求量以获取利益,多样化的市场也可以分担其经营过程中的成本和风险。对于跨国公司来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经济体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其巨大的市场和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构成了很大的吸引力。

第三,效率导向。跨国公司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其根据要素禀赋进行全球布局,根据比较优势优化跨国公司的生产结构,从而利用规模和范围经济以提高生产效率。一方面,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得力于迅速的技术变革,交通和通信成本的降低使得远距离活动不再困难,在全球范围内运输产品变得十分经济,也可以说是节省的劳动力成本远高于由此增加的交通成本。这些做法特别有助于追求效率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各国的出口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新的交通通信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竞争,迫使公司探索提高效率的新方式,其中包括尽早将它们的国际业务扩展到新的市场以及

转移某些生产活动以降低成本。竞争还使得国际生产采用新的形式，有新的所有权和合同安排以及将新的活动设置在海外新的地点。此外，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可以使各公司得以更加有效地管理全球分散的国际业务。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以前发展中经济体不可企及的高技术产业，通过近10年的发展，也可以置于这些国家和地区中，而这些活动中的劳动力密集过程可以在空间上分离。

第四，战略导向。跨国投资形成了新型国际劳动分工，同时也成为跨国公司发展战略、全球扩张的重要步骤。跨国公司为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同时扩大自身的发展规模，希望实现国际一体化生产。另外，为了获取某些特定的战略资产和生产要素，跨国公司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考虑其生产布局，而非将其生产活动仅仅局限在母国和相应的区域内。

政策自由化也促进了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各国都希望借助外商直接投资实现快速增长与发展，因此，针对外资的优惠政策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关键。近10年来，各国各区域的国际投资政策不断变化，但总体趋势是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相关政策包括开放更多部门、放宽对土地购置的限制、打破垄断、国有企业私营化等。促进投资的重点措施包括：提供财政和资金激励，鼓励外资进入一些特定行业或地区，包括经济特区；放宽审查要求，简化批准程序，加快项目审批。为改善商业环境，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和非洲、亚洲的发展中经济体，还降低企业税率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例如，在2009年确定的102项与外商投资相关的国家政策措施中，大多数措施（71项）都是以进一步放宽对外商投资的限制和促进外商投资为目的的。虽然大多数政策变化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但在特定行业出现了一些限制性措施。如表1.1所示，在一些被认为具有“战略性”地位的行业中，出现了对外商所有权的新限制，或者出台了确保政府占有更多收入份额的新措施。2000~2009年，总体来说，对外商直接投资进行限制的措施显著增多了，但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措施仍占较大比例。

表 1.1 2000~2009 年国家和地区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管理规定的变化 （单位：个）

项目	2000 年	2001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实行改革的国家数目	70	71	72	82	103	92	91	58	55	—
管理规定变化的数目	150	207	246	242	270	203	177	98	110	—
更有利的政策	147	193	234	218	234	162	142	74	85	71
更不利的政策	3	14	12	24	36	41	35	24	25	31

资料来源：《2009 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农业生产与发展》、《2010 年世界投资报告：低碳经济投资》。

正是上述因素的驱使以及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使得近10年来的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与过去的几十年相比，不管是总体规模、空间分布，还是产业结构，都发生了新的波动和变化。总体而言，跨国公司的经营范围涉及更多国家和地区，众多发展中经济体在跨国公司产业链中承担着重要的功能；同时，国际投资的产业重心也在不断地多元化和自由化。

1.2 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总体变化

在 2001 年到 2010 年这 10 年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在波动中不断扩张,跨国公司的规模和活动范围在不断扩大。外商直接投资的主体从发达国家逐渐向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转移,后者在国际投资和贸易中的地位在不断上升。据 2010 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在 2009 年最大的直接外资接受国中,中国排在第二位,位居美国之后。同时,在外商直接投资的理想区位排名中位居前 6 位的目的地中,有半数为发展中经济体或转型期经济体 (UNCTAD, 2010)。另外,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迅速扩张,还出现了新的参与者和投资者,包括发展中经济体的跨国公司、国有跨国公司、主权财富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等。这种跨国公司新局面将对全球的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深远的影响。

2001 年到 2010 年这 10 年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不断发展,相对于之前的几十年来说,经历了较大的波动。这可能是由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各国各区域的联系加深、加强,使得波动容易产生较大的连锁反应。从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量和流出量来看,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在 2001~2010 年经历了下降 (2001~2003 年)、回升 (2004~2007 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复苏 (2008~2010 年) 这样起伏的三个阶段 (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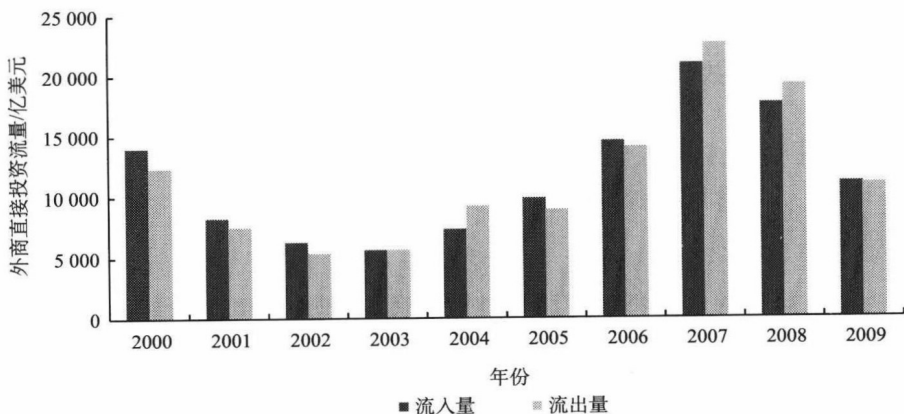


图 1.2 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量 (2000~2009 年)

资料来源: <http://unctadstat.unctad.org/>

1.2.1 第一阶段: 2001~2003 年

在 20 世纪末与 21 世纪初期,外商直接投资继续迅速发展,虽然投资者与接受者仍以发达国家为主,但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扩大了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2000 年,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了 18%,其增速超过了世界生产、贸易等其他经济体的总和,达到创纪录的 1.3 万亿美元。但是在经过 2000 年创纪录的高水平之后,全球资金流动在 2001 年急剧下落,这也是 10 年来的第一次下落。主要是由于全球经济的衰落,特别

是世界的三大经济体都陷入衰退,以及2001年美国“9·11”事件对西方社会经济的影响,这些造成跨界并购的下降。而发达国家之间的外商直接投资除了新兴投资之外,主要来自于各企业间的跨界并购。经济增长放缓也造成了并购与直接投资的减少,从而使得2001年的外商直接投资流量较2000年降低了40%。

互联网经济泡沫破灭、经济衰退对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03年,2002年外商直接投资的流量比2001年下降了26.18%,跌到了199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03年的下降速度放缓,为2.90%。外商直接投资流量连续3年下滑,跌至5600亿美元,下跌再度归因于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减少,共为3670亿美元,比2002年减少了25%。外商直接投资连续3年下降,使得大型跨国公司国外业务规模的多数指标有所下降。不过,虽然信息和通信技术市场的泡沫破灭,但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行业并未大变。全球1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发展中经济体最大的50家跨国公司以及中欧和东欧最大的25家跨国公司的排名亦无明显变化。这说明虽然受到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的影响,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积极性减弱,但是这影响是全球性的,较为均衡,同时也并没有对国际投资产生根本影响(UNCTAD, 2003)。

1.2.2 第二阶段:2004~2007年

全球外商直接投资连续3年下降之后,在发展中经济体的带动下,全球直接投资流量在2004年恢复了增长,且显示出了强有力的回升态势。2004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流量总体在2003年的基础上增长了46%。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回升迅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流向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强劲增长,从而使得连续3年下滑的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量有所回升。发展中经济体外商直接投资2004年的流入量达到2919亿美元,与2003年相比,增长了58.73%。同时,发达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出量增长了54.17%,而流入量的增速仅为13.30%。

2004年,外商直接投资出现回升的原因除了全球经济的回暖之外,还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公司受到激烈的竞争压力。在全球化的驱使下,各个公司面对国内、国际的竞争压力,必须要及时壮大自己的实力,其中之一就是要向外扩张,寻求更大市场以及更低成本,从而提高自身竞争力。第二,服务业持续向国外发展。一方面,服务业在经济整体中的地位上升,2004年,全球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58%,并且这一比例还在逐年升高。另一方面,许多服务无法跨国交易——它们只能在消费地进行生产。因此,随着全球经济不断发展、全球化深入以及各国体制的进一步开放,越来越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将服务业带入东道国,从而使得全球外商直接投资重现活力。第三,新市场的兴起,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的迅速发展,以及逐步开放的政策环境,为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提供了新市场(UNCTAD, 2004),从而激发了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热情。由此,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在2004年出现大幅回升,在这样一个经济背景下,全球外商直接投资还将继续增加。

在2004年基础上,2005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继续增长,世界范围内的流入增速达到35%,流入量将近9900亿美元,但仍不及2000年的1.4万亿美元的峰值。同时,所有主要区域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都出现增长,有的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联合国贸

发会议涵盖的 200 个经济体中有 126 个的流入量出现增长。2005 年, 发达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也出现了强劲的回升, 达到 6200 亿美元, 相对于 2004 年增长了 52.31%。虽然发展中经济体的流入量以及流出量在 2005 年也有很大的增长, 但是从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比例来看, 以流入量为例, 2005 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中, 发达国家占到了绝对比例, 达到 63.36%, 发展中经济体占到 33.49%, 而转型期经济体占 3.15%。尽管如此, 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由于其逐步放宽的政策以及新兴市场的出现, 在国际投资中的重要地位已逐步显现。与此同时, 在政策方面, 虽然主要的政策依然旨在促进国际投资的发展, 但也有一些管制措施出现, 其主要是为了保护区域内部经济, 防范外商竞争或加强国家和区域对某些产业的影响, 这些限制性举措的主要对象是石油和基础设施等战略性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

2006 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继续增长, 流量相比于 2005 年增长了 50% 以上。其中, 发达国家的增速超过了前两年, 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量达到 9700 亿美元, 流出量也创下新高, 达到 11 600 亿美元。而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也有大幅增长, 流入量和流出量分别达到 4300 亿美元和 2300 亿美元。2006 年, 美国重新成为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东道国, 英国和法国紧随其后。总体而言, 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仍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最主要来源, 他们占了全球外资流出量的 84%。而其中, 欧盟国家的外资流出量最大, 世界外资流出量几乎一半都来源于欧盟国家, 特别是法国、西班牙和英国 (UNCTAD, 2007)。在发展中经济体中, 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最多, 其中, 在跨国公司进行海外拓展方面, 中国香港的发展最引人注目, 而中国内地继续成为世界上外商子公司数量最多的东道国。与此同时, 据联合国贸发会 2006 年统计, 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跨国公司的数量, 过去 15 年的增速已经超过了来自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数量。例如, 在世界非金融跨国公司 100 强排行榜上, 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数量从 2004 年的 5 家增加到 2005 年的 7 家。而在发展中经济体最大的 100 家跨国公司排行榜中, 来自亚洲的跨国公司占据了大多数, 共计为 78 家, 其后是非洲和拉丁美洲, 各占 11 家。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发展中经济体, 特别是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在 21 世纪初开始显山露水。

这一阶段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在 2007 年达到顶峰, 全球的流入量超过了 2 万亿美元。美国仍是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接受国, 其次是英国、法国、加拿大和荷兰。其中, 欧盟是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最多的地区, 其外资流入量几乎占发达国家总流入量的 2/3 (UNCTAD, 2008)。对于发展中经济体来说, 2007 年, 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和流出量都创下新高, 分别超过了 5500 亿美元和 2900 亿美元, 外资流入增速更是达到了 30%。这主要得益于亚洲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 以及发展中经济体作为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在国际投资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中, 流入量位居前三位的分别是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俄罗斯 (UNCTAD, 2008)。另外, 就 2007 年发达国家、发展中经济体以及转型期经济体的流入流出量来说, 发达国家仍然是国际投资的主体, 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流出量, 达到 80% 以上, 如图 1.3 所示。但相比之下, 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却占据了 1/4 以上的比例。这说明, 除了区域间的投资贸易合作之外, 很大一部分发达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是流入了具有庞都市